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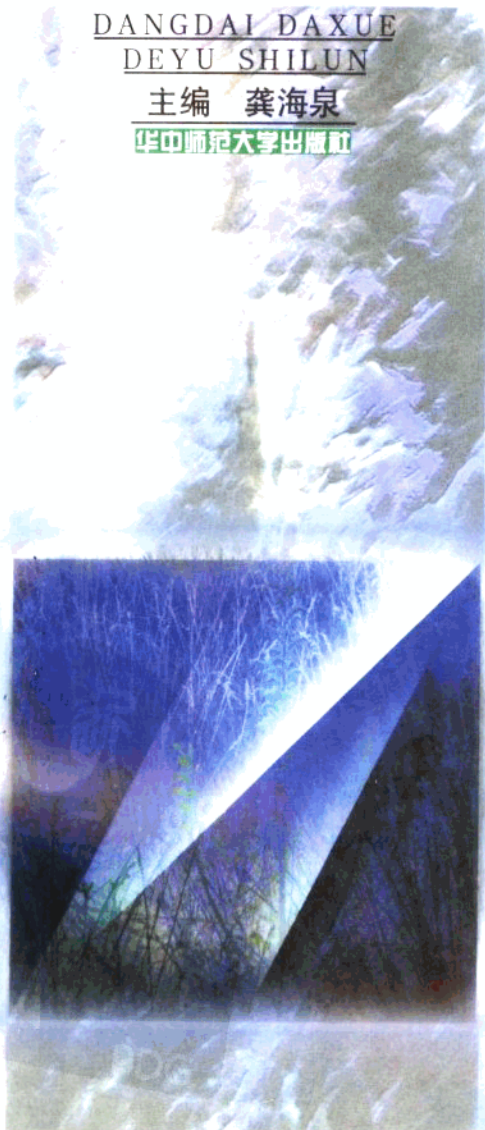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

DANGDAI DAXUE
DEYU SHILUN

主编 龚海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罗 国 杰

龚海泉等同志所撰写的《当代大学德育史论》一书,即将出版。这是一项“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由于我参加了这一课题最后成果的评审和鉴定工作,龚海泉同志希望我能为该书写一个序言,向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件我应该做的工作,于是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

加强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即将来临的充满竞争的21世纪,人才的竞争,占有特殊的地位,而思想道德教育,对高素质的人才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从而保证我们的现代化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头脑清醒,有一个正确而明晰的认识。我们之所以重视德育,强调德育的重要,归根到底,都是同这一根本目的相联系的。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虽然只是整个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一部分,但无论从其重要性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从事这一工作的难度来说,都是尤为值得重视的。因此,对建国以来我们高校德育工作的历史作一番认真的研究,总结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反思与评价,是一部以论带史、

史论结合的专著。它不但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德育工作的成绩和失误,而且还力图探索我国新时期德育工作的规律,其中的不少论述,都会从不同方面,对我们今后的德育工作有所启发。我们一面回顾过去的历史,一面思考今天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看到我们德育工作在过去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的同时,也认真思考着曾发生过的某些失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从这一意义上说,由于作者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本书对我们德育工作的改进,就有着更好的参考价值。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的作者,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科学的理想信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建国以来的德育工作,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全面的回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德育工作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确实,对我们建国以来的德育工作,应当全面地加以审视,我们德育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果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就不能前进;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在德育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使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发挥更好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我们大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出现,是同我们当前的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对我们大学德育工作来说,应该很好地根据这种情况,改进我们的工作;但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是我们德育工作中应当坚持的原则。正因为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因而更应当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应当看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金钱拜物教,把个人的私利当作

是发展经济的杠杆和动力,把追求享乐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明智之士,也曾不断地提倡要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但生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总是以各种形式,花样翻新地不断滋生发展。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个人的私利,当作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决不能以追求享乐的高消费来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更不能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到人和人的一切关系中去,从而出现那种把金钱看作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去崇拜。当前,思想、道德、文化领域所出现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某些反对集体主义,宣扬个人主义、个人本位的思想,都是同我们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不相一致的。在今后的德育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仍然是我们应当强调的。

在大学德育工作中,在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过程中,更进一步加强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教育,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曾产生过忽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教育的情况,这是今后应当改正的。对于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批判地加以继承,不能无批判地“复古”。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决不是去无保留地宣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是要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加具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自“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建国以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革命道德方面,有着更加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传统。革命道德传统,是对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只有体现在当代革命传统之中,才更显现其所蕴含的

强大的生命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这也是我们大学德育教育中应当遵循的一个原则。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在叙述历史、总结经验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德育教育规律的同时，还提出和分析了一些在当前进行大学德育工作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例如，大学德育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思想发展的具体特点，如何从新时期大学德育的个体适应性出发来改进我们的德育工作，如何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我们大学生德育测评的手段和方法，如何巩固、发展大学德育的工作队伍，如何改进我们大学的德育课程，……作者所提出和分析的这些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当代大学德育史论》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一一作出全面的回答，仅仅是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某些还不算太成熟的看法，但它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有帮助的。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是本书的任务，这是有待于今后广大德育工作者作出努力的。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一书，由于它系统、全面和比较准确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学德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的一个空白。我希望这本书的问世，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和提高我们的德育工作，能够有所裨益。

1996年2月

目 录

总论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	1
一、奠定基础时期的大学德育	1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8
三、严重破坏时期的大学德育	17
四、恢复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23
第一章 大学德育地位的历史演变	33
一、大学德育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34
二、大学德育地位演变的历史经验	39
三、新形势下大学德育地位的走向	48
第二章 大学德育目标的形成与发展	58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目标的确立与发展	58
二、确立大学德育目标的基本原则	66
三、大学德育目标的实施	70
四、跨世纪人才培养的德育目标导向	76
第三章 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确立与实施	81
一、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确立及演变	81
二、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实施效果	93
三、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发展趋势	104
第四章 当代大学德育内容透析	109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109
二、关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117
三、关于理想与人生观教育	125
四、关于民主与法纪教育	131
五、关于道德教育	137

第五章 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发展轨迹	143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144
二、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153
三、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新思路	157
第六章 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发展轨迹	167
一、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涵义与历史轨迹	167
二、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实践经验	173
三、探索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新思路	181
第七章 大学德育运作方式的变革	190
一、校园文化的凸现:陶冶式教育的新发展	190
二、社会实践活动的兴起:开放式教育的新发展	200
三、心理咨询的面世:咨询式教育的新发展	209
第八章 大学德育考评科学化的探索	219
一、大学德育考评的意义和作用	219
二、大学德育考评的方法与效果	225
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学德育考评的科学体系	239
第九章 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246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	246
二、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	253
三、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	267
第十章 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变革	272
一、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272
二、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变革的历史经验	281
三、建立和完善大学德育管理的科学体系	287
后记	295

总 论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

在学校教育中，德育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里，大学德育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今天，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因此，认真研究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科学地总结大学德育的历史经验，探讨德育的基本规律，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建国以来，我国大学德育在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后来实践证明却是错误的；有当时被批判为错误的东西，后来又证明是正确的。如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轨迹一样，大学德育也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奠定基础时期的大学德育

从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时间，我国高等教育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这一时期，大学德育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承担着改造旧教育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肩负着创建新教育的任务。党和政府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方针和大学德育的主要任务及其在高等学校的重要地位，逐步建立了实施大学德育的机构和制度，形成了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为主体，密切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和各项社会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使大学德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德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一）确立建国初期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的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①。根据这一规定，教育部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新中国的教育目的和任务，强调教育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中央于1949年10月和1950年2月召开的常委会和第一次全国学校工作会议上，一致认为，“共同纲领所明白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同时也是现在学校中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准绳”，明确指出，“学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而“坚持地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是现在学校中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的主要关键”^②。可见，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对学校的德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确立了建国初期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大学德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对于转变青年学生的立场和观点，坚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专门人才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清除国民党反动的政治教育，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

1950年7月，根据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各高等学校先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训导制度和旨在限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入学保证书”制度，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取缔了一切反动党团组织，开始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最早开设理论课的是华北地区大专院校的文、法学院。他们根据1949年10月1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把《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课列为公共必修课。同年1月，教育部在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强调在高等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的重大意义，从而确立了政治课在大学德育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广泛开设，对于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了总结一年来高等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的经验教训，教育部于1950年7月24日至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并就此发出通报和附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的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提出了在全国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一些规定及原则，对当时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任务、内容、方法以及应当注意防止的偏向，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开始形成了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雏形。此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对高等学校的政治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成绩评定，直到师资培训和教学组织领导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对大学生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和最基本的形式。

（三）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在运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建国初期，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

高等学校的师生都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在运动中一方面热情宣传土改政策，访贫问苦，帮助农民翻身解放；另一方面也从中了解到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了解了农民的爱与恨，沟通了与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初步划清了敌我界限、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还组织学生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实践，这是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好课堂。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各高等学校积极动员师生参加这一运动，他们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一方面协助学校清洗少数隐藏在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师生又一次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

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军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此，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是“要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政治教育”，“反对美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思想，肃清美帝国主义所传播的一切有害的影响和殖民地奴化的买办思想以及其他国民党反动思想的残余”。当时各高等学校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组织时事学习，通过座谈会、展览会等形式，控诉美帝罪行；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动员全国大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写慰问信、送慰问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订立爱国公约，要求学生以爱国热情学好功课，把这项爱国运动与学生的经常学习结合起来，持久地开展下去。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展的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1951年底和1952年初，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资本主义工

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腐化堕落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引导学生学习新社会的道德规范，学习工人阶级热爱劳动、大公无私、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使大学生受到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教育。

结合上述各项政治运动，还在高校师生中进行了一次较为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次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师生中首先发起的，教育部决定先从京、津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于是从1951年9月开始，京、津地区的20余所高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改造旧思想为目的的学习运动。中央对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重视，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主持研究学习计划，而且还于9月29日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以其丰富的经历，亲切、诚恳、令人感动地阐明了知识分子解决革命立场、态度和为谁服务等问题的重要性与艰巨性，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全国参加这次学习的高校教职员占91%，大学生占80%左右，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师生自觉地以自我批评为主，辅以相互间的热情帮助，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都有较大提高，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或单位曾出现过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使少数师生在感情上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四）按照“三好”的要求开展大学德育工作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提出：“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④他号召全国青年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从此，高等学校把实现“三好”作为大学生的奋斗目标，把开展“三好”活动，评选三好学生，作为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励

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按照“三好”的方向来进行工作，要“以共产主义教育青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革命斗争经验武装青年”，要“教育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成为具有文化科学知识，体魄健全，勇敢、勤劳和热爱祖国的人”。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这对于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953年8月，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向学生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努力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在宣传教育中强调正面教育，以理服人，循循善诱，树立先进的榜样，鼓舞学生追求上进。通过学习和宣传，广大学生进一步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受到了一次生动切实的社会主义教育。为了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需要，教育部召开了一系列各类高等学校专业会议，进一步确立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并把对学生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明确地列为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也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随后，在学生中进行的“一化三改造”教育和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活动，就是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

（六）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三个有关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文件，在全国135个大中城市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的群众性的道德教育运动。

高等学校普遍组织学生参加了这一教育活动。在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开展这一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的同时，利用反面典型，联系思想实际，开展广泛的讨论，使大家看清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的严酷事实，认识到自己不是生活在“红色保险箱”里，而是处于被争夺的“拉锯箱”中。在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报告会，向学生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教育，批判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增强大学生的革命道德意识。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文娱体育活动，要求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在学生中起表率作用。通过这次集中的道德教育，给大学生及时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在校园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师生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七）在高等学校开展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

从1954年10月至1956年，中共中央和教育部多次提出要在文化教育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文化学术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高等学校组织文科各专业师生参加了这些批判活动。从1954年10月对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连续批判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批判了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建筑思想，批判了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等。这些学习、批判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增强抵制唯心主义思想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某些合理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也一概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用政治批判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是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学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在新中国大学德育史上第一次开了用政治批判代替说服教育的先例。

（八）强调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

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高教部在《1954年的工作总结和1955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应树立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通过课堂讲授及各教学环节、课外辅导、教学实习、生产实习、个别谈话和课外活动等方式，从学术思想到道德品质，每个教师都应有向学生进行文化科学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责任。教师必须在业务上既能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传授给学生，政治思想上又能以身作则地给学生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这样才能切实贯彻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方针。

1955年1月，高教部批发给全国高等学校的《四个师范院校的视察报告》提出，全体教学工作人员要关心学生，对学生随时随地进行思想教育；各高等学校的正、副校（院）长要对全部思想政治教育负责；要求每个教师在进行讲授时不应是单纯地叙述知识，而要有丰富的思想性。同年4月25日，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在《关于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全体教师渗透在各个教学环节和适当的课外活动中来进行，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多样化，更适合青年特点，使工作更为有效。可见，在这个时候，校长对学生德育工作全面负责的思想，教师、职工全面关心学生，教书育人、管教管导的思想，通过业务教学活动渗透政治教育的思想，已经初步树立起来。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当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大学德育在保证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党缺乏实践经验，加上国际国内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影响，党在指导思想时而出现“左”的错误，导致这一时期全党的工作，包括大学德育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经

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大学德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要求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还说,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④。毛泽东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论述,对德育的地位与作用、德育的领导与管理的论述,是对建国以来德育思想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方针和原则,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并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标准。这些论述继承和发扬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为大学德育提供了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开展大学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德育出现严重偏差

1957年6月,中央决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加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批评,被无限上

纲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表示不满，被无限上纲为反对党的领导；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是非问题发表议论，被当作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等。在方式上采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进行批判斗争，根本不允许被批判者有任何解释和澄清事实的权利。就这样把一大批正直、优秀的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分子”，致使有的学业中断，被分配到工厂、农场劳动改造，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估计过于悲观，提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于是，大学德育便走上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以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为主要途径，以开展“四大”为主要方法的“左”的道路。

(三)通过“红专问题”大辩论，使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严重对立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又红又专的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②毛泽东对红专问题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人们把红的问题看得更加重要，对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作了“左”的片面的理解，只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忽视了红与专的统一。因而在红专大辩论中错误地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把那些刻苦钻研业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当作“白专典型”进行批判，甚至作为“白旗”拔掉，严重挫伤了广大师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还在学生中提出“自觉革命，向党交心”的口号，批判“资产阶级业务观点”，向所谓“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为此，在学生中开展了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事事强调